

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

彭 斐 章

本文重点从历史发展源流上比较分析中西目录学体系的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并从中西目录学产生的文化环境、学术传统与加强国际间目录学学术交流,借鉴外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加速我国目录学整体化发展的进程。

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文化紧紧相联、与学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要受到各个国家的文化机制这一基本要素的制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目录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对以中国目录学为源头的东方目录学和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目录学进行比较研究,正是将目录学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分析各自的发展特征,通过多方面的比较,寻求目录学体系的异同点,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这对总结目录学的发展规律,特别对促进当代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学者程伯群早在30年代就倡导对目录学进行比较研究,随后张遵俭撰写的“中西目录学要论”一文,又对比较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是,长期以来,目录学的比较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粗线条和浅层次上,公开发表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论文,也多以描述为主,甚至在一段时期里,照搬和硬套取代了比较研究。实践证明,只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我国目录学在世界目录学中的地位,通过比较借鉴,丰富我国目录学理论体系,推动我国目录学的整体化进程。本文着重从历史发展的源流上比较分析中西目录学体系的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并从文化环境、学术传统、书目实践等方面说明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中西目录学存在以下差异:

1、中西目录学体系的核心差异

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体系的核心则是“图书的描述”。中国目录学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沃土之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目录

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⑧孔子整理古籍，为《诗》、《书》作序，言其作意，就是揭示图书内容的方法。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当时官府藏书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目录工作的经验，编成了反映先秦至西汉文化概貌的书目《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目录学自来即重学术，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核心思想，并贯穿于整个书目实践活动。我国目录学中明显优越于西方目录学而又具有特色的，不外小序和叙录。小序是我国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一篇说明某部类学术渊源流变的文字，或置于书目某部类之前，如《四库全书总目》，或置于书目某部类之后，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也有将书目各部类的小序集中一起，置于书目之首，如刘歆的《七略》的辑略，王俭《七志》的九篇条例。小序在介绍某一门类学术的起源、演变、兴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叙录一又称解题，或名提要，是我国目录学中有别于西方目录学而又具特色的重要目录体制之一，为汉代刘向首创，他在整理藏书时，除条列书的篇目外，还为每书撰写一篇叙述校讎经过，介绍作者生平，揭示内容主旨，评价图书得失的叙录，为揭示图书内容树立了楷模。后来目录学家大都仿效《别录》，虽有详略优劣之分，但对读者读书治学均有程度不同的导读作用。最具学术价值的解题目录当推公元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它继承了历代书目撰写提要的优良传统，熔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于一炉，由学有专长的纂修官为每书撰写精审的提要。张之洞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⑨

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在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的代表作《校讎通义》一书里，该书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书目工作实践和广泛吸收了古代目录学家的理论体系。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章学诚的目录学代表作是《校讎通义》，由于古代整理图书包括搜辑藏本、比勘文字、厘定篇章、撰写叙录、分类编排，编成目录等工序，故用校讎一词统括校勘、版本、目录。到18世纪清乾隆年间，随着学科的分化，校勘学、版本学和目录学均先后从校讎学中分化而出，目录学已成为清代的一门显学，被史学家王鸣盛称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他在《十七史商榷》中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章学诚根本不承认在校讎学之外别有目录学。然而从章学诚的著作来看，他研究的全属目录学领域，他反对的恰好是行墨字句之间的争辩，因此，他的《校讎通义》恰好是目录学专著。他在《校讎通义》中明确提出目录学思想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特别强调目录学的功能，不仅在部次甲乙，而主要在条别学术渊源流别。他说：“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⑩；又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⑪由上所述，说明中国古典目录学从产生开始就是在重学术、重揭示文献内容、重辨章学术源流的思想指导下发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古希腊诗人、文学家、目录学家卡利马赫(约公元前310—前240年)以亚力山大图书馆藏书为基础编制了《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书目收录的文献不限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包括了当时著名的希腊文献，卷帙达120纸草卷。收录的著名学者涉及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诗人、戏剧家、杂家等，书目对这些学科著名学者的生平作了简介，并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书目著录，整个书目收录的文献，按著者字顺或编年顺序编排，是古希腊最早的书目成果，是亚力山大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被认为是西方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是由希腊文biblion——图书和graphein抄写两个单词合起来的，在古希腊最

初的含义是“图书的抄写”，抄书的人就是当时的书目工作者。后来其词义逐渐演变为“关于图书的描述”。“图书的描述”就成为西方目录学体系的核心，例如《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目录学词条的记载：Bibliography 描述书籍的技术或科学。目录学一词现在有互异而又相关的两种意义：(1)按某种体系编列的书目，(2)关于书籍所用的材料及其编制的方法的研究。《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的目录学词条同样指出：“Bibliography 这个名词用来表示记录出版物的科学、技术，而在用来表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特定产物时，则又称为书目。”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Ferguson J.)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西方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特色，他在其所著《目录学概论》一书中说道：“目录学这个名词，就广泛方面讲，是指“书的记载”和书的内容至少最初是不相关涉的。书的内容是好、是坏、或平庸，均与目录学家无关。目录学家不是书伦学家，而是书种学家”^①。

西方目录学从产生起就是循着以图书为对象，以“关于图书的描述”为核心，以方便检索为目的的思想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2. 中西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差异

目录学核心思想的差异，必然导致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差异。目录学在西方刚刚诞生就带着“图书学”的痕迹，18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将目录学理解为关于古文书学的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英国目录学家贺恩认为，“目录学，简言之，书籍评述之事也，详言之，研究关于书籍的一切知识也。”德国目录学家施业捷尔认为，目录学是关于出版物的学问。《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百科全书》1969—1980年版“目录学”词条写道，“目录学就是关于图书的学问”。20世纪30年代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在其所著的《目录学概论》中说：“目录学是记述书籍的科学或艺术，或科学艺术兼备的学术”，“目录学就是书的传记”^②。

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以学术为起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以指导读书治学为目的。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其所著《目录学》一书中写道：“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踈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③60年代初，我国目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大讨论，反映了人们对目录学研究的各种观点，归纳起来有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和目录说、规律说、目录事业说等，进入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应当从事物的规律、特殊矛盾和本质等方面来探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多数人认为，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对基本矛盾确定了目录学的社会基础，反映了目录学与书目实践的关系，确立了目录学的实践基础。目录学就是在不断地总结、研究解决这一矛盾的规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3. 中西方目录学家研究风格的差异

(1)中国目录学家注重书目的文化价值观，而西方目录学家强调书目的个人价值观。中国目录学从它诞生开始就重视对文化学术的反映，范文澜将《七略》的编成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辉煌的巨著”。他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以来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勤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④章学诚对班固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的评价说：“《艺文》一志，实学术之宗，明道之要。”顾颉刚在《讲史录》中说：“《艺文志》这个部分，写得好。记叙我国古时各学术、学科、学派的源流，”是《汉志》十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⑤。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收书1万多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元代典籍，收罗更为完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文化史。正是由于中国目录学的文化价值观，使得中国目录学家在开展研究时总是带有文化学的色彩。

西方目录学家强调个人价值观。在西方,对于目录学家或者读者来说,最主要的是人,是著作的人,而那些反映人们思想和印象的图书,则是处于第二位的。西方早期的书目主要是使读者熟悉作者,然后对其著作进行全面的、客观的、技术性的描述。在西方,进行书目著录时,是以著者为主要标目,西方的个人著述书目、传记书目非常发达,这与注重书目的个人价值观不无影响。

(2)中国目录学注重理论思维,西方目录学强调方法技术的研究。从中西目录学的整体特征考察,我们会看到中国目录学注重理论思维,而西方目录学强调应用技术的研究。汉代刘向、刘歆两位目录学家,均为汉代经学大师,他们在经学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目录学活动,产生了第一部系统的提要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奠定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刘歆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总结前人目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不仅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概貌,并容纳了当时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书目分类体系,这是刘歆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后世的书目分类产生深远的影响。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会通”历史哲学思想指导下,总结了历代书目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通志·校雠略》,提出了“求书之法校书之道”、“通记古今有无之书”、“编次必谨类例论”、“泛释无义论”、“以人类书论”等一系列目录学观点。又如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在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在他的“道不离器”、“六经皆史”的思想指导下,总结了中国古代书目工作实践和吸取古代目录学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官守学业合一”说,“著录先明大道论”等一系列观点,还对书目分类、互著、别裁等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雠通义》之中。上述例证充分说明,上自汉代目录学形成之初,下迄当今,目录学家代不乏人,数以千计,目录学研究,前后两千年,经久不衰,硕果累累,这些都是历代目录学家从宏观的、哲学思维的高度探索目录工作发展规律的结果,同时,也显示出中西目录学研究视角的差异。

由于对目录学词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中西目录学研究重点的差异,西方国家侧重于目录学方法与技术的研究。福开森说:“目录学家应当研究书的版次、特点、出版地、印刷人、印刷时代、字体、图解、版之大小、校勘、装订、藏者、分类、收入何丛书、见于何目录,他所注意的是书的客观对象,而不是书的内容的道理,目录学是记述书籍的科学或艺术,或科学艺术兼备的学术。”^⑩基于这种传统的图书学派目录学观点的认识,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目录学的研究侧重于方法和技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在书目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机读目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推行,引起的关于书目、索引、文摘的计算机编制,书目工作标准化,书目情报服务自动化,COM装置与COM目录,书目情报工作网络化,文献书目数据库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录学家谢拉在50年代提出以社会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以知识的生产—传递—利用为核心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以便推动目录学理论研究,但在美国,应用研究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二

我们开展比较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比较发现中西目录学的异同点;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析寻求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得出目录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中西目录学在概念体系、核心思想、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大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文化环境的影响

文化背景是影响目录学体系的主要社会因素。一方面,目录学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它是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文化对目录学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这是因为目录学是研究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以及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规律的一门科学。文献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记录和积累的重要条件。谢拉说:“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④中西目录学诞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中国目录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处于百家争鸣的气氛,各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纷纷著书立说。儒、道、法、名、墨等学说并存,学术流派纷繁。先秦时期的著述遗留到汉代,客观上为汉代以学术为核心的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汉代以来,儒家学说得到了重视,独尊儒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时必须以经学为准绳,将六艺置于突出的地位。六艺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目录学在实践上已经和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汉代以后,历代的官府藏书目录和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既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文化和学术的缩影。中国古代文化对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比较重视,而对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则不被重视,这在历代书目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佛经的翻译出版,直接推动着佛经目录的产生。公元4世纪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公元6世纪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都是佛经目录的代表,《出三藏记集》开创了撰缘记、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经目与史料并重,相互参证的书目编辑体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唐代佛教兴盛,释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和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是集当时佛经研究之大成,把佛经目录推向新的水平。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目录学的影响。西方目录学起源于古希腊,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希腊称书目员为抄书的人。因为缮写图书的艺术要求高度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技术,当时,掌握这一技术的人极为有限,所以书目工作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最光荣的职业。从此,形成了西方目录学是“图书的抄写”、“图书的描述”、“图书的著录”的传统。正如法国目录学家马尔克莱对希腊著名的物理学家克劳德·加伦于公元2世纪编制的《个人图书目录》的评论指出的那样“加伦的个人《个人图书目录》,最早表达了目录学思想。不过,这个思想很简单,只是他个人著作的书单子。”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目录学即“图书的抄写”的传统直到19世纪西方目录学即“图书的描述”的传统得到了理论上的承认。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是形成中西目录学差异的原因之一,中西文化体系中科学、宗教、社会意识等价值观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着目录学的发展。例如,中国历代文化均注重社会价值,而西方比较重视个人价值。中国古典书目兼学术之史而成为学中第一紧要事。张尔田说:“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⑤中国古典书目不仅是文献的记录,而且是文化的记录。范文澜称刘歆的《七略》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日本学者金谷治称《汉书·艺文志》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西方古典书目是以系统反映个人著述状况为取向的。即使图书内容空洞无物,书目工作者还是要客观地描述其外形特征。西方个人著述书目是很发达的,书目的起源就是个人著述的描述。

2. 学术传统的影响

学术传统的差异是影响中西目录学研究方法差异的重要因素。

(1)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学为核心,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与经学紧密相联。西方传统学术与宗教关系密切,西方目录学的发展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儒家思想占着统治地位,儒家哲学也就成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经书在历代书目中毫无例外地置于首位,经学的发展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目录学几乎成为经学的附庸。到了清代中期,由于经学的昌盛,使

得校勘、版本、目录均脱离校雠学而独立成学，目录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学术之林独占一席，受到学者的推崇，西方目录学自从与宗教相联系以来，直到17世纪几乎成为宗教的附庸。

(2)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古典目录学以学术史为己任，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通过类例、叙录、大小序来达到考辨学术源流的目的。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歿，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⑨汪辟疆说：“窃以目录之学，有本有末，考六艺之流别，较四部之得失，外以通夫古今学术之邮，内以神其抽绎寸心之用。此目录学之本旨也。”^⑩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这一“本旨”，正是由中国学术传统决定的。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史学科，强调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因而，中国目录学形成重视理论思维的风格。西方的学术研究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即公元5世纪到16世纪基本上处于学术断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对目录学的需要接近于零。目录学的发展不是连续的、累积的。17世纪以来西方目录学实际是在恢复古希腊目录学的面貌，后来由于整理古籍的客观需要，西方目录学到19世纪也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西方目录学以书的外形特征为描述对象的传统也是由其特定的文化学术传统决定的。由于西方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注意采用实验方法，因此，目录学研究中侧重于方法的技术方面。西方目录学成熟较晚，但近年来，在计算机编制书目、索引、文摘方面，在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研究方面显出了重要特色。

3. 书目实践的影响

书目实践是目录学赖以产生的发展的源泉，是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各个国家均有自己特有文化背景和国情，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书目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也是形成中西目录学差异的因素。

书目是文献与读者之间的媒介，文献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发展，亦有赖技术的进步。造纸术在中国的发明是世界文献史上的革命，甲骨、简牍逐渐被纸书所取代，促进了知识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业发达，书籍数量大增，书目工作和目录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造纸术传入西方，取代了羊皮纸、莎草纸和泥版书，新型的图书给书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印刷术的发明是继造纸术之后的人类天才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献生产和传播的速度加快，图书的获取更加容易。古代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均十分发达。西方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引起了西方书目工作的巨大变化。1494年约翰·特里西姆的《基督教作家书目》是铅活字印刷术之后的重要书目，反映了宗教图书印刷的兴盛。活字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普及，古典文学传播和文艺批评发展，使西方目录学面临新的环境，目录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科学性更为明显。没有印刷术的产生，就不可能有文献的巨大增长，也就没有各科书目和书业目录的繁荣，也不会有16世纪盖士纳的“世界书目”及17、18世纪西方许多国家的国家书目。由于欧洲印刷术的应用比中国要晚几个世纪，中国古典书目事业较西方发达，目录学理论研究也比西方更系统和完善。中西方书目工作不同特点直接影响着目录学理论的差异。中国古典书目工作重视类例、书目提要、大小序，注重揭示图书的外形和内容特征。西方的书目工作重视主题、索引、文献，注意图书外形特征的客观描述。

在中国，从周史官掌管档案史料开始，书目活动与藏书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官府藏书的发展对目录学有较大影响。《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广开献书之路，为大规模整理图书、编撰目录创造了条件。历代重视官府藏书，官修目录得以发展。宋代以后私人藏书日渐兴盛，私藏目录增多。由于公私藏书机构担负着抄写、整理、保存、编目、学术研究等多项功能，以藏书为基础形成了国家藏书

总目、佛经藏书目录等多种类型。相比之下,目录学发展显得稍为缓慢。在西方古代既有学者的私人文库,也有藏书众多的宫廷图书馆,西方官修书目不如中国发达。西方书目工作是分散进行的,不像中国那样是集中于专门的机构,由专人负责。正是由于书目工作实践上的差异,使得中西目录学在体系结构上有很大差异。

4. 目录学家哲学思想的影响

目录学家的哲学思想是形成中西目录学研究方法差异的主要原因。目录学家的哲学基础直接影响着研究方法。以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目录学体系。郑樵以“会通”的历史哲学为指导,建立了“会通”的目录学体系,章学诚以“道不离器”的哲学为指导,建立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体系,为了达到目录学的目的,郑樵、章学诚创立了类例·编次,泛释无义,大小类序,以人类书,互著、别裁,校书久任等一系列方法。当代中国的目录学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目录学领域中矛盾的辩证分析和对于目录学现象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西方目录学家是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研究的。西方各国目录学之所以强调方法和技术,忽视理论研究,正是强调实用性的表现。一些新型的分支学科,如书目控制论,也是以控制技术为核心,以书目情报转换、有序和标准化为目的的,带有浓厚的实用性特征。

在古代,中西方目录学家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方法研究目录学领域的现象,看到了文献的物质和知识两个主要方面,但由于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异使中西目录学的侧重点不一样。在中国,整理图书的活动包括图书的收集,版本的挑选,图书的校勘以及书目提要的编纂,形成了以“校讎”为核心的目录学,包括了对图书形式和内容揭示的研究。但随着历史研究的需要,目录学逐渐集中于文献的知识方面。而文献物质方面的研究形成的版本目录学不过是目录学的一个分支,甚至受到校讎学家的非议,反映历史学方法对于目录学的巨大作用。如果说中国目录学以揭示文献内容为核心,那么,西方目录学更重视文献的形式,从图书的抄写到图书的记录,目录学家不是以历史学家出现,而是以文书、书商为职业,不仅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还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图书外形的描述吸取了科学分类和图书馆学的方法,形成的描述性书目,而关于图书外形特征的分析应用了调查研究方法找出有关著者、出版,稿本出处的证据,形成分析和文本的以及历史的目录学,与文学、语言学和文献学密切相关,这与西方重视方法和技术的传统是一致的。

总之,中西目录学产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各自沿着不同的轨迹前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术风格。长期以来,中外目录学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加之我们对中西目录学的差异了解不透,对形成差异的原因剖析和认识不足,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甚至有人提出要抛弃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完全照搬西方目录学发展模式,这种认识对发展我国当代目录学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认为,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担负着继承、借鉴、弘扬和创新的任務,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作为发展当代目录学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参考。与此同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目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吸取外国书目情报事业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经验,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全面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加强目录学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弘扬我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成就,确立中国目录学在世界目录学体系中的地位。

(转第 99 页)

不可调和的,在冷战结束和共同敌手(原苏联)消失后的新条件下,“西西争斗”的激烈化和公开化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特点之一的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特别是“北富南穷”和“西西争斗”加剧所造成的新态势,不仅会给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主要目标能否实现带来重大影响,而且也会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前景起不可轻视的作用。

注 释:

- ① 《世界经济》(修订版)第2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 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6页。
- ③ 参见拙文:“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格局演变过程中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载《世界经济》1991年第6期。
- ④ 《欧洲经济共同体》,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 ⑤ 参见:《世界经济》(修订版)第4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7、271、288—289、300—301页。
- ⑥ 参见拙文:“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 ⑦ 据《美国统计摘要》1992年,第830、839、849页;《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本,第244—245页资料计算。
- ⑧ 美国国际储备中有巨量黄金储备,1990年按市场价格(每盎司385美元)计算高达1024亿美元。因此,各国1990年国际储备中的黄金如均按市场时价计算,则三大经济中心的对比将是另一种图景:当年美、日、欧共体三方国际储备额依次为1730.9亿、878.3亿和4812.5亿,即为,100:50.7:27.8。参见:《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本,第252—253页。
- ⑨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2》,英文版,第12页。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

(接第147页)

注 释:

- ① 马克思:《十九世纪外交史内幕》,第41页。
-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 ③ 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
- ④⑤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互著第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 ⑥⑦⑩ (英)福开森,耿靖民译《目录学概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34年出版第1、2、5页。
- ⑧ 姚名达:《目录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126页。
- ⑪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 ⑫ 谢拉:《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 ⑬ 张尔田:《校雠学纂微序》,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 ⑭ 郑樵:《通志·校雠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⑮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本文责任编辑 江 平)